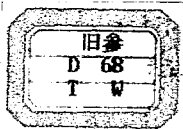


D68
TW



宣傳叢書之三



討

汪

中國國民黨武長株萍路
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
宣傳委員辦公室印

目次

爲汪精衛等背叛黨國稱兵搆亂事告國民書.....	中央執行委員會
汪精衛的評價.....	胡漢民
長沙慘劫與汪精衛.....	胡漢民
汪精衛勾結共產黨之淵源與經過.....	胡漢民
閻馮汪勾結的因緣與汪精衛降共的實証.....	胡漢民
汪精衛赴平之內幕及其將來之失敗.....	劉蘆隱
汪精衛之過去與現在.....	曾養甫
汪精衛之罪惡.....	楊熙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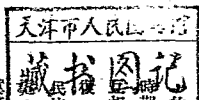
目

次



二

爲汪精衛等背叛黨國稱兵搆亂事告國民書



中國民族之唯一坐路，在依總理所定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程序，以實現三民主義。故本黨於北伐完成以後，即確定統一和平之政策，以期結束軍事時期之工作，開創訓政時期之一切建設事業，以立憲政時期之基礎。兩年以來中央與全黨同志及全國國民，朝夕相勵勉期許者，即在以臥薪嘗膽之精神，就十餘年來劫亂所餘之國，力謀社會元氣之恢復，與人民生計之發展，同時即欲以此逐漸恢復發展之國力，實施各種之建設，以開中國民族新生命之途徑。不意桂系馮閻諸軍閥，即在此兩年中轉叛亂，不惟視黨紀國法如弁髦，且不惜直接與我全國一致渴望統一與和平之國民爲敵。中央于去年一再開全國編遣會議，冀導之于正軌。乃口血未乾，叛謀遽露。彼輩竟始終以中央平素誠信寬大之政策爲軟弱，以彼輩過去歷試不爽之失敗爲偶然。稱兵禍國迄不悛悔，及其窮促之勢已成，則閥之於馮，可以變仇爲友，李白與張，亦可以認賊作父，南北殘餘軍閥之深相勾結，互爲聲援，遂以釀成此次之叛亂，而重陷吾民于水深火熱之境。中央忍痛戡亂，數月於茲，前方將士，

爲汪精衛等背叛黨國稱兵搆亂事告國民書

明知非撲滅此輩軍閥，無以保障全國人民生命財產所賴以寄託之統一與和平，非保障全國統一與和平，無以實施全國人民所賴以繁榮發展之政治經濟社會建設諸計劃。故寧捨身赴義冒暑殺賊而不辭。出師以來，南已掃蕩張李黃白諸逆，因其殘部於桂林，北已擊破馮閻逆軍之主力，向平漢臨海膠濟三線奮勇邁進，逆敵之滅亡，可立而待，惟逆敵當此，勢窮力竭之時，忽以其所謂擴大會議者，搖惑國人之耳目；而變節失志之汪精衛，竟欲憑借其歷年由共產黨傳受所得之秘術，盜竊本黨名義，利用偽擴大會議爲進行一切反革命勢力聯合戰線之資，夫擴大會議既不見於本黨總章，而按之事實，凡參與偽擴大會議者皆爲舉國所深惡痛絕之軍閥政客，觀其所參列之反革命份子，約分五派：一曰馮系，二曰閻系，三曰桂系，四曰西山會議派，五曰改組派，雖各派中亦有曾任二屆或二屆中央執監委員，然其資格或因任期屆滿而喪失，或因背叛中央而被革斥，乃猶視顏自稱爲本黨黨員，甯非滑稽之尤。然而此種藏垢納污之反革命集會，閻逆始欲藉以作個人籌安之具，今則汪逆復欲劫持之以爲玩弄幻術之資。蓋汪所恃者，乃改組派諸政客，而改組派者即共產黨之變相，無論若輩表面之言論行動如何變化，其中心策略，終不離乎蘇俄帝國主義所指示，參加任何變亂

，破壞任何社會之組織，而在無間斷的變亂中，推動共產革命高潮之一種陰謀。汪逆之計以爲此時參加閥閥諸逆之反叛，一方面可以延長戰禍，一方面即於戰禍延長之中，隨其機緣，取甲部分同盟者之勢力，而代之以依附乙部分之同盟者，待其機緣再至，則更取乙部分同盟者之勢力而代之，以依附丙部分之同盟者。如是遞轉推進，則彼輩將無時而非參加變亂，亦無時而非在變亂中玩弄反革命之陰謀，以冀增加一己之勢力。惟汪之欲逞此種計謀，則必於此次閥閥叛亂之際，施其逢迎鼓惑之伎倆，以騙取一切反革命份子之大混合，庶以後線喬韓閥之伎倆可得而施。因此之故，汪逆既以積不相能之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混合爲第一幌幕，復厚顏以互相仇視之殘餘軍閥之聯絡爲第二幌幕，更以湘贛等處共匪之勾結爲第三幌幕。而每一層幌幕所收各不相容之種種別派，則以一切狐媚挑撥之策略而徐謀逐一戰勝之。凡此種種，蓋即蘇俄共產黨利用聯合戰線之策略，而汪逆正盡力運用者也。此次汪逆抵平，於湘則有長沙共匪之慘禍，於贛則有樟樹豐城等處共匪之活躍，湘贛人民，俱見若輩獨無打倒汪馮兩人標語，是此次湘贛人民所遭焚劫屠殺之禍，誰爲主謀不言而喻，證之以中央討桂將士抄獲汪逆於七月三十一日致李逆宗仁之密電，汪逆因張發奎所部前經覆

沒，乃昇以聯合湘贛共匪之責，並約共匪於八月十日分道會攻武漢，迫朱毛彭賀分犯樟樹長沙，汪逆遂電李逆宗仁率部兼程入湘，以爲後應，而不知李逆殘部，已被圍於桂林，又何委員應欽電告所獲共匪之口供，亦復證明汪逆實陽與軍閥混合，而陰與共匪爲緣，由此種種事實，而回溯此次軍閥叛變之過程，閥逆於北方爲倡亂之首，其結果則引出一汪，汪逆亦始終與共產黨爲後援者也。故晉桂兩系軍閥之叛亂，結果祇爲共產黨與蘇俄帝國主義造機會，而此輩軍閥之本身，行且不俟國法之相加，而巳自墮於共產黨之陷阱，蓋可斷言。此次汪逆煽起長沙共禍焚戮人民，中央不及事先援救，實爲痛心。不知汪等結何仇於湘民，而必欲陷之死地，聞逆黨尙以長沙之禍爲未足，方欲以其所以禍湘民者禍他省之民衆，我全國國民思之，此民窮力殫之國中，豈容軍閥政客共產國與帝國主義交相吞噬竭澤而漁之計乎？抑將劍及履及共起撲滅反革命派褻挾重重之惡勢力乎？當此反革命派陰謀重迭之日，本黨念總理與無數先烈創業之難，誓當戢平逆亂，剿滅共匪；務與國民同在和平統一大道之上，完成建設三民主義國家之使命。我國民如欲聽北平廢集之反革命份子甘言誘惑，則共禍

勢且逼起，國家可以立亡。非然者則當嚴是非之辨，察治亂之勢，勿以小不忍而予匪黨以暴動之機，勿聽調言而隨反動政客挑撥之計。庶逆亂之勢既窮，赤色帝國主義最大之陰謀，亦無得而逞，而數月來我全國上下忍痛討逆之戰，亦克早奏全功。

中央執行委員會印

汪精衛的評價

胡漢民

——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立法院紀念週演講——

汪精衛之爲人及其生平。

汪精衛所以急趨愈歧，終於不能覺悟的原因。

評汪精衛最近的言論與行動。

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挑戰，是汪精衛與梁啟超的相同點。
在革命的立場上，凡腐化的必惡化：凡惡化的必腐化。

各位同志：上次紀念週中，兄弟對於北平所謂擴大會議的性質，經過，及其組織等等

汪精衛的評價

，已經約略報告過。目前汪精衛已到北平，並發表了他的所謂政見，想在這山窮水盡之時，圓一回他的黨魁夢。許多同志，不明瞭這光怪陸離的景象，以為這些變節份子的賣黨的政見，也許要影響到黨的進展了；有的甚至懷疑到這些人的本身，何以如此忘本，甘心投靠軍閥，做賣黨賣國的勾當。其實這兩點，都很明瞭。第一：他們賣黨的政見，既已違反總理的主義，失却革命的立場，當然不會影響到黨的進展，因為黨是一個革命的集團，總以主義為骨幹的。其次，這些人所以甘心投靠軍閥，做賣黨賣國的勾當，一言以蔽之，便是惑令智昏；由於惑令智昏，才會倒行逆施，在革命的觀點上，早已沒有存在的可能。

在這烏煙瘴氣，光怪陸離的北方，汪精衛到北平，似乎是一件比較引人注目的事。的確，自總理逝世，以極左的——左到要與共產黨通家的汪精衛，與今日極右的——右到與西山派合作為國禍壽安的汪精衛相比，真令人有判若天淵之感！總理初逝世後的汪精衛，高唱着「黨權高於一切」，「革命的向左轉，不向左的滾出去」，「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口號，與「革命者不妥協不投降」等等，同為構成他所自命的左派首領的原素。他還發表過論文，說明所謂左派者，在黨的活動方面，要（一）打倒帝國主義，（二）喚起

民衆；在黨的機體方面，要（一）鞏固黨的組織，（二）森嚴黨的紀律。誠然，這些主張，本是革命黨應備的要素，不值得獨冠左派之名，颯然以首領自居。但是目前的汪精衛，究竟如何呢？向來主張黨權高於一切，現在已誠惶誠恐，俯伏於軍閥膝下，變做「軍權高於一切」了。向來主張革命的向左轉，不向右的滾出去的，現在已一右而與軍閥合，再右而與西山併了。向來主張反共產就反革命的，現在不但反了國民黨，且凡革命黨人所不屑爲的，他竟爲之而不辭了。到北平的第二天，便明目張胆地發表取消以黨治國的主張，把擁了五六年的特製的國民黨左派首領的招牌，親手敲得粉碎，而他所持的唯一理由，便是：「在此危急存亡之際，……只有一面單獨的負起責任來，一面多找些相當的人，共同的負起責任來。」因爲現在是他的「危急存亡之際」，所以總理的主義，可以不要，左派的招牌，可以打破。因爲現在祇要「多找些相當的人」，所以所謂中央黨部的擴大會議，可以由黨員擴大到非黨員，由腐化官僚，擴大到鴉片煙鬼，由蘇俄走狗的馮玉祥擴大到洪憲忠臣的閻錫山，這種理由，豈不滑稽已極！

於此，我們要考究汪精衛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在本黨二十餘年的革命過程中，兄弟和

汪精衛，一同追隨 總理努力，彼此算是最親密的朋友。精衛爲人很聰明，做文章也有條理；總理在時，他效忠主義，矢志不懈，不失爲本黨忠實的同志。但是他之所短，在於沒有研究性，對於事情，往往隨聲附和，拿不出固定主張。他自己曾再三告訴我說：「我是歷史的腦筋，沒有創造的天才的，如果人家想出好的主意，交給我整理出條理去辦，那是我之所長」。我們觀察精衛，確是如此。所以 總理在時，如果出好主意叫他去辦，每每弄得很好，而且他言談也好，對外一切，自得到許多幫助。但是惟其他沒有研究性，拿不出固定的主張，自信力太差，——自己對自己的認識不清楚，所以一離開 總理和同志，便寸步難行。而他終於要行，便至一變再變，落到今日的田地了。這些事實，——尤其總理逝世後的一切，凡本黨同志，都是十二分明瞭的。

十三年以後的汪精衛，是左得要與共產黨通家的，他的「革命的向左轉」，「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的口號，以及十六年自海外歸來，盜竊名義，在滬與所謂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者，聯合宣言等等，都是明顯的例證。但是 總理在時，他却反共最力，記得民國十三年時，汪精衛便很堅決地反對容共，以爲共產黨徒如果闖入本黨，本黨的生命，一定

危險。譬如西遊記上所說，孫行者跳入豬精肚內，打跟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能忍受呢！可是總理一死，他爲領袖慾所中——爲共產黨所惑，與共產黨大有「惟一傾心，相結恨晚」之概！步着陳良的後塵，奮起「精衛見鮑羅廷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的老調了！我們不用說「用夏變夷」和「事之——總理——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的濫套，但是汪精衛自己設想，究該如何自解呢？十五年開二次代表大會時，他聲勢洶洶，對我們華僑的兩位同志說：「你們國民黨的人，自己不爭氣，這樣下去，我是要把國民黨送給共產黨了，」這兩位同志，後來把這話轉述給兄弟，且言且泣！當他與共產黨打得火熱的時候，又再三宣言：「要和鮑羅廷生在一處，死在一處了」。我們當時聽了，又氣又笑！其實鮑羅廷活着，自然爲消滅國民黨，計想和你們暫時厮守，共共衾枕，過過同床異夢的生活，難道死了，還當真要和你同穴麼？果然，自他在武漢提出「從腐化惡化的夾攻中奮鬥」的口號以後，與嗜好甚密，共衾而想同穴的鮑羅廷，居然分居了。大約目前想與之死一處的，不是鮑羅廷，而是閻錫山馮玉祥，甚至抽大煙的趙不廉了。從腐化惡化的夾攻之中奮鬥的結果，如此如此，這在本黨誠然失了一個可用的人才，在他自己，也辜負了總理二十

餘年的教誨，生生的葬送了自己啊！

兄弟常說，汪精衛所以愈趨愈歧，終于不能覺悟的原因，一方近於「夸夫死權」，但求自己領袖支配慾的滿足；而同時又深中「狃於蒲騷之役」的大病，每以自己爲有了不得的本領。總理逝世未久，便事炮羅廷如總理，甚至想與之生在一處，死在一處，結起所謂革命的聯合戰線來。一個十分完整的中國國民黨，「我不懂總理惟一的遺產，偏要分出左右派來，而自爲其所謂左派的首領。共產黨的苦肉計，深深地打中了夙無主張，而又「夸夫死權」的汪精衛的弱點，終於叫他伏伏貼貼的跟隨着，鑄下如許無可彌縫大錯誤。

其實，我們爲革命而努力，是沒有所謂領袖與非領袖的，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地位的高下，權位的大小，絲毫與革命無關。汪精衛把革命事業，牽涉到私人的位望上，刻刻想以領袖自居，便是他失敗的總原因。其次，民國十四年前，汪精衛沒有掌握過政權，分擔過政治的責任。十四年時，因曾一度任國民政府主席，每自以十四年廣州之治，爲冠絕一時，由此錯誤的心理，便時時想過他未足的主席繼。實則五年以來，汪精衛在廣州，在武漢的政績，都爲我們所共見，所謂十四年的廣州之治，究竟有甚麼成績呢？汪精衛事之如

總理的鮑羅廷，便是他的太上政府，在他對客揮毫，大寫其「革命的向左轉」的情勢之下，共產黨幾乎篡竊了中國國民黨的黨權，滅絕了我們的辛苦維護的革命勢力，廣東全省，大弛煙賭禁，搜刮到民窮財盡，無以為聊生！至於十七年武漢之治，尤其明顯了他親口提出了「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居然以共產黨的護法自任，先利用唐生智以演兩湖之慘禍，復利用張發奎以成廣州之焚殺，兩湖廣州的人民，被禍之酷，受創之深，迄今言之，猶有餘痛！這些事實都已成了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傷痕，還忍引以自豪，居為不世出的功勛麼！

提起張發奎，我們尤其憤慨，一個本能革命的青年軍人，不肯好好的指示以應走的正道，偏偏當他做自己的賭本，作孤注之一擲。到現在張發奎疲於奔命，不能不實行下野了。有訓練的軍隊，都生生地葬送在廣西湖南之間，這在革命的武力上，又是何等重大的損失！去年十一月，汪精衛自為其護黨救國軍的大元帥時，驟使唐生智張發奎等共叛中央，聲勢洶洶，有不可終日之概！他曾志得意滿地宣言：「待張發奎一得廣州，我便開闢入粵，主持大政」。事情結果，總算汪精衛做了一場大夢，廣州的大政，終於沒有輪他來主持

這一次，大概又是熱中過度，強要把張發奎進攻湘鄂，想與馮玉祥說一個會師武漢的把戲，汪精衛的賭本也就完全斷送了。「如果張發奎沒有特殊的勢力，我是決不能依人籬下的」這是汪精衛在香港九龍時的豪語。現在張發奎的特殊勢力已經消滅，汪精衛此時到平，究竟是寄人籬下呢？還是算主持大政呢？「十年血戰結果如此。」應該是張發奎最慘痛，最覺悟的呼聲吧！

汪精衛硬生生地割裂中國國民黨，自冠以左派首領的頭銜，本已十分荒謬。因為中國國民黨，本是革命的，進步的，急激而不妥協的政黨。不過事實上，假定汪精衛死心塌地，真做了極端的左派，也未始無補於革命。但他忽左忽右，全無一定的主張，有時抄些我們已行的事實，算他最新的政策，有時搬些共黨陸儉的學說算他最新的理論，到現在胡適之的「好人政府」，以及「我們什麼時候有憲法」的妙文，也一古腦兒搬做他的政見了。他說：「我們應該照建國大綱，製定一種根本法，確定政府機關之組織，及人民公私權利之保障」又說：「我們應該取消以黨治國，和總理訓政的主張，一切要以培植民主的勢力為基礎。」這樣，總理主張以黨治國，主張訓政，不成了民主主義的罪人麼？又說：

「民衆運動應按照建國大綱，由地方自治做起，嚴防共產黨激起階級鬥爭的禍害。」我不懂，我們倡導的七項運動，及頒布地方自治的各種法規，是不是按照建國大綱，由地方自治做起的？何以以前他偏偏反對，甚至以爲不覺工人罷工運動，不覺農民抗租運動，是違反了共產黨的經典，蔑棄了第三國際的勅令呢？他今日這些話，我們還不明他的用意究竟何在呢！

過去的汪精衛戴上左派首領的高帽子，開上整萬萬不兌現的支票，以冀獲得一般的謳歌和崇仰，出這支票的銀行，本來早已倒閉，而他揮動毫端，簽發無已，可憐無知的同志們，還拚命的等待着，期分得若干餘潤，噫一噫他自己的饑涎，同志們！這一個沉沉的大夢，到今日總應該蘇醒了吧！我們總合汪精衛的過去，變節改論，反覆無常，其前此背叛總理，敬事共黨的事實，瞋目前與他沆瀣一氣，同流合污的謝慧生鄧海濱，也不能否認。至於目前的投壘軍閥，賣身閹瑪，更是有目共見，無可遮掩的事實，在他所謂政治的見解上，實可與時而革命，時而保皇的梁啟超媲美，獨不解汪精衛與梁啟超，天天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而不會體無完膚自漸形穢，可嘆我們崇高偉大的總理，不是頑固卑

劣的康長素所得倫比，而有相當革命歷史的汪精衛，却甘心與全無政治人格的梁啟超爲伍，我們頗念總理耳提面命的教戒，矢忠矢信的遺訓，真禁不住無量的慨嘆啊！

兄弟前年說過：革命者的失敗，祇有兩途，不是腐化，便是惡化，同時凡腐化的必定惡化，凡惡化的也必定腐化，以汪精衛論，從前左到和共產黨併家，——要和鮑羅廷死在一處，這似乎是惡化了。其實他的原意，祇在憑藉共產黨的力量，完成他黨魁的大夢，其內容全是一種腐化，到今日山窮水盡，甘心爲閻馮籌安，也絕然由這個思想出發；寶貴的歷史可以賤售；民族的危機可以忘却；而自己的領袖慾支配慾不能不滿足，因爲不能滿足，便可以賣身投靠，向人所共棄的萬惡軍閥呼着「我皇萬歲」而不惜，自己的骨氣何在？革命的人格何在？清夜捫心，不該慚愧麼？上海報載：「北平有人，想一瞻平民式的領袖！汪精衛的孝采，却是軍警森嚴未得通過。」「擴大會議一流人都想聽汪精衛的議論，却是汪仍持黨魁態度不多發言。」「擴大會議，以爲汪精衛到，將有長足發展，却是汪要首先約見閻馮，候取進止。」事實上告訴我們是如此，更不必更下何等批評了，現在聽到安福政學的餘孽，也印上歡迎汪精衛的傳單，註上名字，表示不落人後！一個白面書生的左派

首領，何苦自落到這個地位呢？共產黨的秘決，是「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爲道德」汪精衛服膺此言，終身誦之。由此倒行逆施，惟所謂成功是求，甚至成功一點鐘兩點鐘，乃至一天兩天，也都不管了。聰明而能文的汪精衛，終於陪送在此，豈不可嘆！

長沙慘劫與汪精衛

胡漢民

——十九年八月四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演——

汪精衛勾結共匪，造成長沙慘劫的實據。

所謂左派改組派與共產黨的關係。

扶植共產黨在兩湖的力量，是十六年汪精衛在武漢的唯一政績。

共產黨是有主義有革命抱負的政黨麼？

鮑羅廷所謂鴉子的故事，及其錯誤。

革命不是爲自己找出路，不該做無食不飽的狗子。

各國政府對於長沙事變應有的認識。

輿論界對於孫氏禍國，反覆無常的叛徒，應該予以嚴正的制裁。

各位同志：上月二十七日晚，湖南共匪彭德懷黃公略等，撲攻長沙。當時我們一部分軍隊：正追剿張桂；一部分軍隊，方肅清湘西，長沙駐軍不多，便不幸爲共匪攻陷了。共匪進城以後便佔據機關，開始殺人放火的工作。在放火方面，凡官署，黨部，商店，領事館，教堂，學校等等，無一倖免；至於殺人，除公務員商人，殺無赦外，凡穿西裝，着長衫的，戴眼鏡的，身體肥的，手韋細滑的，也一律殺害，殘暴酷虐，過於李自成張獻忠，這是湖南人民三百年來未有的浩劫。中央方面，已令海軍飛機開向長沙，并嚴令何雲樵與各部積極進剿，據昨日報告，長沙共匪，已被海軍擊退，克復長沙，當不至成什麼問題了。

長沙事變，正發生於汪精衛到平，開什麼擴大會議的時期，我們回想十六年汪精衛住滬，開會議的時候，便唆使黃琪翔張發奎焚燒廣州的事實，對於此次事變不能不說與汪精衛以及所謂擴大會議有嚴重的關係。滬報說：「汪精衛等開長沙事變後，商議發表宣言，謂不如此，便犯着嫌疑，受人攻擊。」這是不打自招明明要標着「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果然昨日滬報又載稱，「擴大會議於二日急電李宗仁，進兵長沙，」而汪精衛對人表示，

亦謂已命李宗仁放棄廣西，進長駐沙。這是他們勾結共匪最明顯最有力的證據。我們不懂汪精衛究竟做了甚麼大夢，還希望被圍桂林柳州覆滅在即的李宗仁，進駐長沙，但是於此可見他於互相利用，互相勾結，同一要將整個中國民衆來殘害，是一件不可聽言的事實。

汪精衛陳公博等，夙以左派和改組派自命，所謂左派和改組派便是接受第三國際的勅令，爲共產黨走狗的集團，有人說改組派爲準共產黨，還不免重大的錯誤，共產主義者說『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爲道德』，在這個口號之下，他們的花樣多得很多，汪精衛陳公博等也有時受共產黨攻擊，便不是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沒有淵源，那我們敢說已被共產黨開除黨籍的陳獨秀，譚平山，也不是共產黨，也不與共產黨有淵源麼？汪精衛過去，曾敬事鮑羅廷如總理，想與之生存一處，死在一處，又提出了『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大做其共產黨的護法，就他反覆無常，事事搖擺的性格看來，與共產黨藕斷絲連，通同一氣，正是意料中事。所以前年張黃焚殺廣州，汪精衛發言返粵討共時，李濟深便說：『汪精衛此言，不過掩人耳目罷了：他自己攪的把戲，難道自己去討伐麼？』此次從長沙逃難的人，看見共產黨所貼的標語，除他們的祖宗馬克斯列寧以外，把上下古今的人物，幾乎都全

部打倒了。而却沒有打倒汪精衛馮玉祥的標語，其中究圖何鬼，也該爲我們所明瞭了。

民國十六年，汪精衛在武漢的第一件政績，便是盡量扶植兩湖共產黨的力量。在他當時，也并非真和共產黨誠心相結。不過思想憑藉共產黨的力量，造成他日夕所期望的領袖而已。他們當時覺的最起勁的，便是農民運動，把兩湖的農民運動開了農田，天天開會遊行，當時有劉委員主持農民部事務，覺得這樣的農民運動，如果繼續下去，農民的生機，必將全部斷絕，便向汪精衛唐生智爲提議保障農民的生活，提出幾種真正爲農民謀幸福的方法，汪精衛唐生智回答他說：『你的計劃是反革命的，我們現在的做法，叫置之死地而後生』。如果農民有生路，還肯同我們來革命麼？這種荒謬的見解，終於爲共產黨樹下根深的基础，造成很大的機會，此次長沙事變，僅較著之一端而已，所幸他們在廣東下毒，沒有如兩湖之深，所以共產在廣州作亂，屠戮如李福林的軍隊，也能立時平定他們，否則當時禍患所及，一定會和現在的長沙一樣。

一般無識的人，總迷信共產黨是有主義，有革命抱負的政黨，這簡直是極大的笑話，姑不用說他們的所謂主義，在經濟學說上，早已沒有存在的可能，即就事實來看，在中國

的所謂共產黨，而不肯共己之產；其手段除殺人放火以外，更無他道。至於蘇俄，自改行新經濟政策後，早已趨向國家資本主義，而一切政略也無不抄襲帝國主義者的成規，自中東路事件發生以後，其真面目已越發顯露了，我們可以堅決地說，他們到處所鼓動的，所謂世界革命，其目的并不在要求世界革命工作之實現，而在於利用他國的騷亂謀保障本國的安全，尤可痛心的，此次蘇俄共產黨大會，斯丹林很明顯的向衆宣言，「中國目前又有亂事發生，這是我們妨礙中國國民黨統一的好機會。」而我們搜到所謂共產黨的決議，也說：「該趁改組派到北平搗亂的機會，積極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破壞的工作」，可嘆；所謂中國的共產黨徒——一切殺人放火的強盜們，和背叛主義，破壞黨國的反革命者，竟甘心以國家民族為犧牲，直接間接做蘇俄走狗而不惜，自命為尊重黨紀，而自己的一切又處處超乎黨紀之上的汪精衛，竟又發縱指使造成空前的長沙慘切，與馮玉祥同為其匪擁護的巨魁了。事後還致電李宗仁，想他「進駐長沙」還一個「趁火打劫」的勾當，人民無辜，慘遭荼毒；其喪心病狂，不是已至於極點麼？

從汪精衛的變節政論，反覆無尋，兄弟又想起一件事來，報告各位，記得鮑羅廷在廣

州時，有一天同我們閑談他對於戴季陶先生的態度，十分不滿，以爲犯了外國故事中一只驢子的毛病。他說：『在外國故事中，有一隻驢子，一天肚子餓了，便下山來覓食。山脚下有兩方草地一方在左，一方在右，都豐美可人，這驢子見這兩方草地，不禁猶豫起來，想到底吃左邊的好呢？還是吃右邊的好呢？遲疑不決，終於一方都沒有吃，結果也就餓死了。現在戴季陶同志，在革命工作上，也和這驢子一般，向左向右，總不肯決定下來，其結果非也到餓死不可』。饒羅廷這個故事，也許可以針砭一切優柔寡斷的人，但其用意之惡，實令人憤慨！須知我們在革命的工作中，是沒有所謂左右的，只有 總理的遺教，才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準繩。戴季陶先生從來不左，從來也不右。共產黨是他所反對的，雖然當時他們的力量很大，但反共的西山會議，他還親身去參加，并曾努力著述想從思想上糾正他們的錯誤，做一番防微杜漸的工作。他的著作，如『中國國民黨與國民革命』，『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等，都是當時反共產主義最嚴正的文章。乃如汪精衛者，竟爲這種無稽的故事所惑，想則效所謂聰明的驢子，專求一己的生存。始而拚命的向左，賣身共黨，繼則拚命向右，投靠軍閥，到今日只要有食能搶便無所不爲，他自然不肯做饒羅廷所說

被餓死的餓子，却變做惟臭是逐，一味搶糧的狗子了，把革命來當做求食，只做得一個飢不擇食的餓子，已至可痛，乃竟等而下之，竟甘爲一味搶糧的東西，我們對他，更有何種話可說呢？

以往的事實，是大家十分明瞭的，姑就去年的事情說，總遣會議以後，軍閥一再蠢動，陰謀破壞統一，經我們不斷的努力，已消滅李宗仁，擊破唐生智，並予馮玉祥以嚴重的懲創，當時閻錫山的野心，雖然很大，但也已不敢有所作爲了。我們滿想今後總可以根本總理的主義，推進訓政的建設，乃汪精衛喪心病狂，重又唆使張發奎回竄廣州，謀作第二度的焚殺，同時勾結唐生智，中途倒戈，作在武漢重組政府的企圖，雖然他們的計畫，全盤失敗，然而兵連禍結至今未已，禍首罪魁，究該誰屬呢？我們知道要做好一件事，是十分困難的，本黨經過去數十年的努力，才獲前年僅有的統一，廢除不平等條約，如關稅自主等等也已有相當的成效，照此下去，恢復中國的自由平等，已是一件十分有望的事。而汪精衛等，不顧國家，不顧民族，但求自己的出路，便不惜倒行逆施，這是一件何等可痛的事；

此次長沙事變，汪精衛等又勾結共匪，大做殺人放火的勾當。固然，殺人一事在蘇俄共產黨以恨爲基點的，所謂共產革命中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實。可是放火一事，究竟是馬克斯說過呢？還是列甯說過呢？大家知道蘇俄是反對宗教的，但是莫斯科二千多處偉大的宗教建築，始終沒有動過毫末。如果放火便是共產革命，那他們爲什麼不先把偉大的宗教建築付之一炬呢？蘇俄黨人也是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口號的，何以當時他們不把莫斯科列甯格勒各處的使領館通通燒去呢？共匪在長沙燒了領事館，想藉此引起國際的糾紛，予本黨政府以難堪，這種計畫。不能不說他毒辣，但我們相信各國政府對於事實的真相，也應該十分明瞭，不見得便如從前的愚呆，肯上共產黨的惡當了。共產黨這種說法，只是愈發暴露他們自己的罪惡，予各國政府以一番認證而已！

在共產黨的一再擾攘中，我們所最引爲遺憾的便是政府過去對於處置反革命者的過於寬大，前此張桂攻入長沙，釋放了許多被禁的共產嫌疑者，和前年張黃焚殺廣州時有同一的情形，共禍之烈，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現在國民政府已決議將反革命治罪條例，交本院修正，這一件事本院同人應該予以深切的注意。此外我們更感覺在過去的時期中，

所謂輿論的力量未免太薄弱了。反覆無常，寡廉鮮恥的人，也竟盡量的縱容他，從不予以嚴正的制裁，到今日還能冒著國民黨的招牌，召集違背黨章的擴大會議，爲軍閥作帳，爲閻馮籌安，而同時又勾結共匪，自爲其所擁護的巨魁，誠然以袁世凱老奸巨猾，惡人未久，便身敗名裂，爲天下笑，但是輿論界有輿論界的責任，尤其在這一個人類艱難危苦的時期，更該爲民族的生存起見，摘奸發伏，燃犀鑄鼎，以端正人民的視聽，這一個嚴重而切要的工作，也希望大家能深切地予以注意。

汪精衛勾結共黨之淵源與經過

胡漢民

各位同志：中央軍隊，於上星期克復泰安，目前中路軍已過界首，左翼軍與右翼也已越過肥城平陰……等處，向濟南圍攻。大約星期內，便可把濟南規復了。當時閻錫山以爲中央軍和馮軍相持於膠海綫，各已筋疲力盡，便承襲他『專事偷巧』的故技，向津浦線突進，我們將計就計，一退再退，引敵深入，期予以嚴重的懲創。果然，曲阜泰安兩役，殲滅逆軍大半，現在他們的戰鬥力，已經喪失，此後長驅直入，無疑的將如摧枯拉朽了。隨海

汪精衛勾結共黨之淵源與經過

線方面，中央軍亦佔優勢，再經數度激戰，便可得完全的解決，長沙方面，亦經收復，中央並於上星期責成何敬之同志，肅清湘鄂贛三省匪共，現已開始進剿，破獲甚多，我們對於軍事前途，實抱無限的樂觀！

兄弟說過：「謂反革命的聯合戰線，終於是一句空言，而不會有實際的表暴的。」這一句話，已經為過去的事實所證實了。民國三十四年時，我們在廣東的環境，其險惡較今日為尤甚。北江的沈鴻英，盤據韶關，勾結北方軍閥，不絕的向廣州滋擾，東北和南路的鄧本殷等，也聲氣暗通，輪流為患，結果這三路逆軍，終於為我們所消滅。過去兩星期中，共產黨焚殺長沙，圍錫山為害山東，馮玉祥困守鄭汴，而喪心病狂的汪精衛等，又在北平大逞其所謂擴大會議，為一切反革命者張目。聲勢之盛，使一切對於革命沒有穩定的信仰的人，都憂嘆恐懼危疑震撼起來。然而現在究竟如何呢？共產黨與閻錫山，已成強弩之末，頑強困守的馮玉祥亦已一籌莫展，賴其匪軍閥以偷生的汪精衛，更可知了。尤其是可笑的若干所謂外國的軍事專家，在過去數日中，也對中央軍抱起無限的悲觀來，以為反革命的勢力如許雄厚，戰線如許延長，中央軍想克敵制勝，不僅是困難，簡直是無望了。他

們不知道他們是外國軍事專家，不懂中國的戰事的特質，更不知我們有革命抱負的軍隊，與一切反革命的軍隊作戰，尤其有重大的不同，民國十三年時，我們在廣東以極少數的軍隊，撲滅沈鴻英陳炯明鄧本殷等巨量的逆軍，當時的所謂外國軍事專家，有誰會認為可能的呢？民國十五年，我們敢以三四萬人毅然北伐，并在極短的時間中，擊破吳佩孚，消滅孫傳芳，掃蕩張宗昌，完成初步的統一。更是那一個外國的軍事專家，能確信我們有把握的呢？吳佩孚當時，見我們定下出湖南，攻武漢，撲江西的計劃，便譏笑我們不明戰略，以為列隊如長蛇，祇要中間一剪，便首尾不能相顧了。可是戰事的結果，證明國民革命軍不是長蛇，而是神龍，自命為長勝將軍的吳佩孚，祇有竄回四川，做他們關門的大帥了。於此，可斷言我們一切根據三民主義的政略之戰略，不是尋常的所謂軍事專家所能推測和論斷，而反革命者的失敗和消滅，更無庸我們作無謂的疑問了。

關於長沙事件，兄弟已於上星期紀念週中向各位報告過。當時兄弟曾根據汪精衛過去與共匪勾結的事實，與報載汪精衛命李宗仁進駐長沙，和長沙共匪獨無打倒汪精衛馮玉祥等標語的消息，判定汪精衛對於長沙事變。實犯有重大的嫌疑，但不過是推測而已，六日汪精衛勾結共黨之淵源與經過

得到何敬之同志的電報，與陳濟棠同志在柳州，搜出汪精衛致李宗仁的電報，才知道上星期的推測，竟不幸而言中了，何同志來電說：

『於通縣拿獲紅匪軍第八軍先鋒隊長楊國峯一名，訊據供稱：『此次攻取長沙我係第八軍先鋒隊長，……進行計劃，已與李宗仁張發奎等之代表商洽好了。李宗仁張發奎已與北方馮國璋聯合，是由汪精衛從中介紹的。……將長沙攻下之後，即會合各處紅軍，攻取武漢，……聽我們盡量燒殺搶劫』。

陳濟棠同志抄出汪精衛致李宗仁密電說：

『……證以馮之對兆銘懷疑，閻之對兆銘冷落，西山派之暗中反對，終恐不能完全照我計畫實行，惟切盼西南派及兩湖方面，對貴軍之竭力進攻，而擴張聲援，庶使兆銘有充分發言餘地。……朱毛彭賀，已分兵佔領樟樹長沙，……即請貴軍兼程入湘，與彭賀等軍聯合一致。……兆銘已電向華分別接濟湘贛共軍，并謀切實聯絡。……』

最近我們又搜得顧孟餘於一日給馮玉祥的電報說：

『兩湖共軍蜂起甚順利。……除由汪先生請德麟副司令率軍入湘，在有與各地共軍聯

絡，俱由向華接洽，我等既站在同一反蔣之戰線，此事自不成問題。」

本來有今日之情形之下，所謂站在同一反蔣之戰線，他們祇要能破壞統一，危禍黨國，求個人野心的發達，還有甚麼是成問題呢？記得一個月前，我們查到麥煥章給馮玉祥的電報，大意說：「前此我們和副座主張聯絡各地雜軍，而總座不許，以為有損軍譽，現在事已至此，總座已有此決心，儘可放心做去。」所謂總座者，閻錫山也。從上述的電報中，證實閻馮因為勢窮力蹙，才糅合共匪，謀作最後掙扎。同時，更明瞭二年以來汪精衛之所謂反共，究竟是甚麼把戲了。他的勾結共匪，焚殺長沙，不已得了更有力更堅確的反證據？固然，我們十分懷疑一個被困桂林，覆滅在即的李宗仁，是否更能重行入湘，與共匪聯絡，使為馮懷疑，為閻冷落，為西山派暗中反對的汪精衛，有充分發言餘地。但其窮蹙無聊，倒行逆施的醜態，早已經盡情顯露了。

爲了長沙事變，他們急於發表宣言，以免被人攻擊，這個消息，兄弟上星期也已經報告了。果然，幾天以前，我們在辛博森主編的英文導報上，讀到他自辯的妙文，如果大家看了，真禁不住懸縲索絕呢：該文的大意說：

汪精衛勾結共黨之淵源與經過

「這次長沙事變，共產黨大燒殺人放火的勾當，使湖南人民重受荼毒，推原其故，蔣中正實尸其咎。他苛於對待馮閣，寬於制裁共黨，故將後方軍隊，都調赴前線作戰，後方空虛，共產黨便乘機爲亂了。我們則不然，李白在廣西，雖然軍事緊急，尙到龍州剿共，可知長沙事變，和我們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大家看了這樣滑稽突梯的自辯文，再看看上列搜得的口供和電報，究竟得到些甚麼感想呢？兄弟說過：他們的宣言，一定是明標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到如今，這句話又不幸而證實了！他們說：「長沙事變，蔣先生實尸其咎。」其理由便是蔣先生「苛于對待馮閣，寬於制裁共黨。」這不啻一幫無賴的盜匪，先在事主家的前門放火，等到事主全家到前門去救火了，他們便進後園來搶劫，結果反罵事主說：誰叫你前去救火的呢，如果你不去救火，我們不是不能進後園搶劫了嗎？或者竟再進一步說：誰叫你設法藏盜的呢，如果你沒有多大的家私，我們不是不來覬覦了嗎？各位試想，除了喪盡是非羞惡之心，而向輿論自辯爲「人」的東西以外，有誰能說出這種無賴的話呢？而汪精衛等竟有這副嘴臉，發表這所謂昭告中外的宣言，頑鈍無恥，更不必下何等判斷了。

於此：我們且拋開長沙的事變不論，先一究所謂中國共產黨的淆亂，究竟是汪精衛助長的呢？還是蔣先生引起的呢？歷史的事實，是任何人不能掩蓋的。本黨同志，都應該深切知道 總理逝世以後，汪精衛爲領袖慾所中，體行共產黨的詭謀，硬生生地分化中國國民黨，龐然自大地做他所謂左派的首領，是五年來共產黨張，本黨破裂的總根源，爲明瞭事實的內容計，我們且把 總理逝世前後所決定的陰謀與策略，作一番概括的檢閱：

第一 總理逝世之前，共產黨所決定的策略：

「……分化國民黨的左右派使之發生劇烈的衝突」。

「把國民黨中的工人，農民，及智識階級的急進分子，結成左派，宣傳國民黨中的軍人，官僚，政客，資本家爲右派」。

第二 總理逝世以後，共產黨全體大會決議的要點：

「我們（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各級黨部，并且要在國民黨外如社會團體，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指摘國民黨中及民族運動中的右派和帝國主義妥協。……并暴露國民黨中派遊移的態度。」

汪精衛勾結共產黨之淵源與經過

「我們（共產黨）應當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是在民衆宣傳上，擴大國民黨的左派。」

「完全在我們（共產黨）同志指導之下的國民黨各級黨部，應該努力宣傳黨員羣衆，使他們都有明確的左傾的觀念。」

這裏所最能打中汪精衛的心坎的，便是所謂「擴大國民黨左派」了，他知道共產黨要努力宣傳黨員羣衆，使他們都有明確的左傾觀念，假如自己做了左派的首領，國民黨的領袖，不是一定能穩穩的到手了嗎，于是便心悅誠服，竭智盡能，履行共產黨預定的策略了。「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不過他在熱中過度以後，一張最明確供狀罷了，事後——到與共產黨似乎反臉而實相結納的十六年，却說：「在那時候，（民國十四年）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何以故呢？他自己曾歌說。「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睛，都被罩着，只顧往前直衝，不容傍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麼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固然，歷史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汪精衛當時的一切，是否「不是出於什麼自私之心，

「和」當時的實在情形，」但是汪精衛做了兩隻眼睛都被罩着的馬，只顧往前直衝，衝碎了整個中國國民黨，——我們總理唯一的遺產，是他已經承認的了，但是在精衛可曾知道馬夫鮑羅廷，當時是高坐堂皇，頤指氣使的鞭着 you，車中的共產黨，方歡欣鼓舞擊節稱賞你是一匹好馬呢？

民國十六年，共產黨陰謀愈亟，我們同志，都感覺到非實行清黨，已不得足以鞏固黨基，策進革命了，可是方從海外歸來的汪精衛，竟持甚麼態度呢？第一件大事，便是盜竊名義，與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的聯合宣言，這宣言的內涵，很明澈地打破了本荒謬的「容共政策」，且進一步確立了更甚荒謬的「聯共政策」，當時蔣先生吳先生等主張：（一）趕走鮑羅廷，（二）清黨，汪精衛反對，以為有關容共政策，不能輕變，如果要變，必須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先生便容納了他的提議，決定於南京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可是汪精衛在開會之前，忽然不告而別，偷偷地逃往漢口了，在船中還寫信給李石曾先生，說什麼「十三年改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等等。」他就死認定所謂「容共政策」，是不能更改的，否則便是犧牲十三年改組的精神，破

汪精衛勾結共黨之淵源與經過

境本黨的組織和紀律，可是一到本黨的清黨運動，惹起了蘇俄幹部派和反對派的內訌時，汪精衛也不待中央全體會議的決定，在莫斯科「反共倒蔣」的詭謀之下，居然分共了，所謂「容共政策」，所謂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和本黨的組織與紀律，在表面上也一律犧牲了，我們本來不懂所謂「容共」究竟是誰確定的政策，大家知道，總理允許共產黨份子加入本黨，正如李大釗所聲明「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加入的，不是將整個團體加入的。」假如他們的行動，違反了本黨的主義與政策，本黨便應以森嚴的紀律，予以嚴重的制裁。這種決議，在十四年五月，本黨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已很鄭重的確定了，而汪精衛當時却忘掉這些，并蔑視總理「操之於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的遺教，別尋其所謂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和本黨的紀律與組織，以為搪塞，事後，又甘心在炮聲延擱之下，做看兩目被罩，感頹直衝的好馬，來一套分共的假戲，在他們分共的宣言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不願輕率的放棄革命聯合戰線」等等肉麻可憐語，還連篇累牘，不堪卒讀呢！

我們若干同志至今惑於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一文，以為武漢方面當時確已由國

民黨肅清了共產黨，并相信汪精衛與共產黨已脫離干係了，但是歷來的一切，能使我們相信這是事實嗎？「在國民黨中要取灰色的態度」。『要使人不知道自己是CP』。這是武漢分共時，蘇俄給中共黨員的訓令，也就是劉盧隱同志所謂：『第三國際對中國國民黨的蠱魚戰術』。這個戰術的經過，是莫斯科下令『反共倒蔣』時，汪精衛便帶領共產黨的右派，做『反共倒蔣』的工作，共產黨的左派便担任宣言，『退出武漢政府』，莫斯科下令葉賀張黃在『南昌兵變』時，汪精衛等共產黨右派便担任『明令張黃，討伐葉賀』，而共產黨左派，便担任分隨賀葉張黃進取廣東，莫斯科下令『寧漢合作』時，汪精衛等共產黨右派便担任到滬寧驅成『甯漢合作』，而左派則在粵在滬，大做其秘密搗蛋工作。

這是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所用左右夾攻的手段，而始終爲蘇俄盡力，誠心爲其走狗的便是賣身共逆，分裂本黨的汪精衛。這種堅確不移的事實，還容我們來否認嗎？兄弟常說：『在布爾希維克主義者『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爲道德』的信條之下，他們的花樣多得很多，有時合起若干人來做一套正正經經的把戲，旁觀的人，稍不留神，還不知道其中所鬧的鬼呢！』前清士子做八股，最講求的是起承轉合，共產黨的一切，便有類乎此，舉例來說：

汪精衛勾結共產黨之淵源與經過

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陳獨秀，譚平山等，都是共產黨的走狗，但有時也忽然互相攻擊起來，是真的互相攻擊嗎？非也，這不過是他們做文章的方法罷了，有時陳公博做一個起，顧孟餘甘乃光便來一個承和轉，汪精衛便做一個合，有時陳獨秀或汪精衛做一個起，譚平山甘乃光便來一個承轉，陳公博顧孟餘等便做一個合，好在汪精衛曾說過：「共產黨的額上，是不雕字的」。來此一套，又有何妨呢？這便是「共產黨之八股學」，大家回想過去的事實，不是「信而有徵」麼？可恨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中，却還囂然地自己掩飾，說什麼：「共產黨經此一番嚴密的防範之後，知道計無所施了，祇有糾合賀龍葉挺一般黨徒，在南昌發難，以希圖一逞，……國民黨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進於嚴厲的驅共了」。其言論之支離破碎，始不論，但請問這究竟是事實麼？這「不是什麼違心之論」麼？作僞至此，亦適見其心勞日拙耳。

我們談起已往的事實，再回想本黨破裂的經過，祇有一陣一陣的心痛，兄弟今天所以重又提起過去汪精衛勾結共產黨的事實，不過想糾正汪精衛等以長沙事變歸咎於蔣先生的荒謬，并益發暴露其陰謀詭計而已，有許多人說：汪精衛五年以來，所以倒行逆施，都由

「爲目的不擇手段」所致，照兄弟想，這一句斷語，實不免過譽了，什麼是手段，什麼是目的，目的的純正與否，手段的得當與否，目的與手段是否出發於革命與否，都是應當先決的問題，在過去的事實中，汪精衛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孟子說「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不摸，則不得妻，則將摸之乎？」從這一段話中，須知道「得妻」是籠統的一個目的，而摸其處子，乃正是踰東家牆的目的，得妻這個目的沒有什麼好壞，但是在古代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現代也必須經過交情戀愛的階級，和一定的手續，如果見東家有一處子，便要踰牆而摸之，以爲如此便達到得妻的目的了，試就常識來判斷，是行不行呢？汪精衛一切，本談不上什麼目的，假定以「得妻」爲目的，則「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的手段，已爲常識所不許，何況汪精衛過去，又僅僅以「摸其處子爲目的。」「而以踰東家牆」爲手段呢？在過去實際工作的期間，汪精衛曾再三申言：「只管國民革命，等到國民革命的結果，橫豎大家死在地下，三民主義也好，非三民主義也好，終於任後人去解決。」根本這一個觀念，所以總理在時，他可以跟着革命，總理既死，便結上施羅廷，儼然以左派首領自居，到目前，又可投靠軍閥，使共匪重演長沙焚殺的好戲了，

汪精衛勾結共黨之淵源與經過

同志們聽了，這是汪精衛革命的信條，他不儲得革命，所恃的祇有主義，離開主義而講革命——講所謂左右傾，祇有走入反革命的一途，在這個情形之下，本黨同志，——我們總理忠實的信徒，能以「爲目的不擇手段」一語，彌縫汪精衛，過去的罪惡，寬大地予以諒解嗎？

理由是很明顯的，在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僅有三民主義，是整個革命的理論，唯有真切地認識三民主義，依照總理所規定的革命程序，而求其實現，才是整個革命的工作，全國同胞——尤其輿論界同人，應該以此爲準則，——辨是非，明順逆，對於目前烏煙瘴氣的局面，做一番廓清擺陷的功夫，汪精衛過去，因於本黨有相當歷史，於政治上又自命有若干見解，在他「不管三民主義也好，非三民主義也好，終於任後人來解決」的革命信條之下，已不知驅逐了若干人的思想，迷惑了多少人的斬向了，我們同志，以及指導社會的輿論界，爲國家獨立，民族生存計，對於這卑劣無恥殃民禍國的妖孽，亟應該奮起指擊，以留存國家民族的正氣啊！

閻馮汪勾結的因緣與汪精衛降共實証 胡漢民

——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在立法院演講——

各位同志：中央軍已於十五日克復濟南，閻逆主力，被消滅者約在三分之二以上。本來他有十二三萬人，泰安一役，我們繳了他一萬多槍，此次克復濟南，又繳了他三萬多槍；膠濟線敵人不能退出的尚有三人，其他散落民間的槍械，也在七八千左右，至於大砲，在迭次倉忙敗北中，當然不能攜帶，甚至在濟南泰安一帶的飛機，都不能臨時飛走，其狼狽情形，也可以概見了。

克復濟南，是此次討逆軍事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前次我們定計放棄濟南，閻錫山便沾沾自喜，以為他的軍隊真了不得了，於是積極召集汪精衛等，大撻其所謂擴大會議，想假借黨的名義，弄一個所謂「相像的局面」。可是據昨天滬報載日聯社等電，稱「晉軍失落濟南消息傳到北平後，北方當局……非常狼狽。從昨夜深更起至今晨止，擴大會議委員，政客，軍事當局，其他重要人物，赴鐵獅子胡同訪汪者，絡繹不絕，均憂愁滿面。……」可知平津一帶，恐慌已極，其不能有為，也很明顯了。臨海方面，自五六日起，馮逆為救

閻馮汪勾結的因緣與汪精衛降共實証

應濟南計，迭次反攻，自濟南克復，也便望風奔竄，據聞馮已決定放棄陝甘，向閻要求退守平津，共保河北山西的地盤。雖然汪精衛等頗望馮來，但閻以爲「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大抵要緩辭拒絕了。我們預料閻海路戰事，日內也一定有較大的進展。

在津浦線一月以來的戰事中，我們十分贊佩蔣先生調度軍隊之得宜，使他們能各用所長，和敵人搏鬥，同時對於各路軍隊奮勇猛進，「滅此朝食」的精神，也表示無量的欽佩，韓復榘同志等固守膠濟線。以靜制動，使逆軍疲于奔命，固然是此次殲滅逆軍很大的助力，而蔣光鼐蔡廷鍇同志的兩師，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路，直抄入濟，與許克祥同志以兩團之數挺進，當逆軍數倍之衆，更足爲戰史生色。而且蔣蔡許各軍，都方從廣東湖南調來，長途跋涉，路又不熟，而能建此奇勳，教導各師及劉峙同志所部，則久戰不疲，所向皆捷，均足以證實 總理「有主義者必勝，無主義者必敗」的遺教，是如何的堅強不移了。

據若干日本軍事專家說：「晉軍最大的欠缺，在於沒有精神，作戰時每到一處，首先要弄個陣地，爲固守計。同時也有相信人家的陣地，也一定是好的，所以往往不敢進取，

坐失時機。』這幾句話，真說中了晉軍的弱點。民國九十年間，山西軍會一度到過湖南，給我們打敗以後，大家便研究北方的軍隊，到底那一省好些。當時有一位同志很滑稽的說：『在繳械的時候，祇有山西軍的槍架放得整齊，大概山西的軍隊，是北方最好的軍隊了。』我們從上述一正一反的觀察中，便知道晉軍之不行，是『其來有自』了。去年編遣會議以後，閻錫山表面服從編遣會議的決議，請中央派人點驗，中央便派了幾位將領去，其中有一二青年同志，爲兄弟所認識的，回京以後。便報告說：『到了山西，閻就告訴他們，『我的軍隊不講額數，軍士的精神也不放在表面，除非臨了戰陣，守了地方，才能顯出我們軍隊的真精神，涿州大同之役，便是明證了。假如此次你們單作呆板的點驗，一定建不到甚麼特殊的成績。』閻說這些話，固然在拒絕我們的點驗，同時也著實說破了他自己的弱點，於是閻軍之『孱弱無能』，『不足有爲』，便成了他們一致的信念。此次泰安濟南之戰，僅把他於的信念，作一番證實而已。

五個月前，兄弟便說過，『閻錫山是一把兩面刀，動機是想反正都討便宜。結果却反正都遭失敗』。他認爲民國十九來祇有人上閻錫山的當，沒有閻錫山上人的當，政局無論

閻馮汪勾結的因緣與汪精衛降共實證

如何變化，他總是坐鎮山西，兀然不動。革命黨革命，可以響應；袁世凱做皇帝，可以派趙戴文勸進，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弄權稱霸，可以服從；國民革命軍長驅北伐，可以投機參加；張發奎唐生智馮玉祥等歷次叛變，又可以暗中牽線，乘機擴張自己的武力；這許多形形色色的局面，他都一一應付過，且又無事不操勝算，便傲然自信以爲天下之大，惟「我」爲「行」了。記得民國十六年，閻錫山加入本黨北伐時，兄弟便問現在本院委員的西山同志說：「閻滿口信義和平，大概這個人還靠得住吧」。這位同志說：「一個人的野心，是逐步發展的，閻錫山貌爲謙遜，心實陰險，目前他固已做了國內數一數二的人物，但看他過去的事實，也保不定有想做『唯一者』的野心呢！」當時是大家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罷了。半年之前，竟不幸一一證實了。初時他提出若干『禮讓爲國』，和『聯合三屬執監』等等的謬說，以爲門面。經我們一番痛駁之後，便露出真相，積極作實際的準備。他既西山派可以變做山西派，兩點水的馮玉祥和三點水的汪精衛，可歸到山西的汾水去。既有供他在前線犧牲的人，又有幫他辦理所謂的黨務，以造成叛變的理論的人，於是志得意滿決心作孤注之一擲了。可是就目前的事實看來，西山派和汪精衛誠然已『徹底協議』，一

籌莫展。閻錫山賭本却已先玉祥而犧牲了。結果如此，怕非自命爲「老謀深算」而實「陰險詭詐」的閻錫山始料所及吧！

有許多人懷疑，以爲照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等過去的歷史看來，是斷乎不會融合的，現在竟不倫不類的融合了，這究竟是什麼理由呢？其實閻馮汪三人的歷史，自始便很相同。閻錫山的過去，兄弟剛才報告過。馮玉祥更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反覆無常寡廉鮮恥的軍閥，他做過蘇俄的走狗，也做過國民黨的同志，反段祺瑞，反曹錕，反吳佩孚，逼黎元洪的好戲，都曾一幕一幕地親自演過。某一時期，更當過基督教徒，弄到許多外國人，都譽之爲能行博愛主義的基督將軍。他却諱言的對人說：「人家是吃教，信教，我不過是用教罷了。」和閻錫山本是死仇，到現在又似乎深相結納了。

關於汪精衛 總理在時，還不失爲中國國民黨的同志，總理一死，他奉鮑羅庭如總理事之以恭順，甚至於遠過於總理，以他們三人這樣歷史，在今日各求發達其野心——我所謂出路的時候，其暫相結納，當然不是一件奇事了。有若干人說：他們之所以如此，不過「爲目的不擇手段」而已，這一句話，兄弟上星期已很嚴正的剖晰過，譬如一個強

盜，他爲吃飯而搶東西，以搶東西爲手段，以達到吃飯的目的。已爲人類常情所不許，何況吃飯終於是一個籠統的目的。有些強盜，究至以搶東西爲目的呢。試問這種目的，我們能承認他是目的麼——能承認是正當的目的，而任人不擇手段去亂搶麼？

再如爲了「得妻」便「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以「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的手段，來達到「得妻」的目的，也不能爲常情所許可，而有些人的目的，本不在「得妻」而在「樓其處子」這種行徑，是不是也爲我們所能容忍呢？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等的一切，祇可與搶東西的強盜，和樓處子的無賴同科，還談得上所謂目的，所謂手段嗎？

有人問汪精衛究竟是共產黨員呢？還是非共產黨員呢？這問題，怕現在的人還不容易下斷語，因的汪精衛曾說過：「共產黨的額上，是不雕字的」，只有觀其所行，察其所由；才可得其大概罷了。民國十五年時，有若干同志說：「與其稱汪精衛做國民黨同志，還不如叫他做共產黨信徒，因爲汪精衛如果是國民黨，便不應該叛了總理，叛了國民黨，更不應該如他所管收變了孫行者，鑽入豬精肚內打筋斗，使金箍棒，弄得豬精不能承受」。這幾句話，在今日看來，實已得了更多的根據，五年以來，汪精衛的一切，幾乎唯共產

黨之命是聽，民國十五年，他秉承共產黨「奪取國民黨的武力」的策略，造成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之謀殺，幸而蔣介石先生預知逆謀，馬上將它解決了。事後汪精衛託病離粵，實則仍潛處廣州，等到鮑羅廷由海參威回來，秘密會見一次，得了什麼面諭，才悄然去國了。十六年我們要清黨，他却一定要遵守所謂黨紀和十三年改組的精神。我們邀他到南京，他却偏偏『共產黨命召，不俟駕行矣』的跑向武漢。在武漢舉行蘇俄命令，做了一套分共的假戲以後，便又叫陳璧君跑回廣州，回廣州不到三天，黃琪翔張發奎便在廣州大燒大殺了。有人說：『汪精衛在北平，曾以汪季新的名字，加入共產黨，做了所謂中國共產黨的秘書長。』這句話的是否確實，似不用兄弟來考證。然而總合過去的事實看來，汪精衛破壞本黨，背叛革命的功績，實駕陳獨秀瞿秋白而上之，以一個謀刺攝政王坐過監獄的汪精衛，雖然做了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叛徒，却又成所謂中國共產黨的健將，那就汪季新有無取得共產黨黨籍，亦不值得研究了。

於此，我們姑退一步說：假定汪精衛不是共產黨員，那末汪之受共產黨擒縱——被玩於股掌之上，是一定無可諱飾的了。總理將死時，加拉罕和鮑羅廷召汪精衛到蘇俄大使

館談話，當時本院委員馬超俊同志，也和汪同去，加勉兩人，同聲對汪精衛說：『孫先生的病，看來已經絕望了，今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除了你更有誰敢繼承呢？』汪精衛聞之，便欣然色喜，這是他生平受寵若驚的第一次，而背叛總理，背叛本黨，甘爲共產黨工具的心腸也於此種下了。誰都知道總理未逝世前的汪精衛，是反共最力的一人。民國十三年，他的孫行者豬精的譬喻，固已透關絕倫，爲國人所共聞，便是相侍總理北上時，他對於共產黨，還極懷敵意呢，當時兄弟奉總理命，留守廣州，總理未啓程前，即命汪精衛起草北上宣言，并命鮑羅廷參加意見。鮑羅廷來時，因爲汪精衛不懂外國語，便請伍梯雲同志翻譯，鮑羅廷說一段伍梯雲同志便譯一段，汪精衛聽了便對伍同志說：『我們留心吧！他又想染紅我們的面孔了』。可知當時的汪精衛對於鮑羅廷的鬼蜮伎倆，未嘗不十分明白，以這樣一個明察秋毫的汪精衛，却禁不起領袖的作祟，共產黨的搖惑，會幾何時，便做着他們的工具而不悟！把自己的面目完全改變而不悟，這是一件何等可嘆的事！

兄弟講過：『革命是爲人民找出路，不是爲自己找出路』汪精衛把革命事業，牽涉到私人的位望上，刻刻想以領袖自居，便是他失敗的總原因，汪精衛過去，曾入過什麼進德

會，以不作官爲標榜。實則在今日看來，他祇志不在小官而已，記得民國十一年時，吳稚暉先生會很爽快地對汪精衛說：『你標榜不作官，便好比標榜不入毛廁。但你却始終捨不開毛廁，天天聞其臭氣，這究是何苦呢！還不如進了毛廁倒好多了。』民國八年，汪精衛同陳璧君由海外回來，一到廖仲愷先生家裏，便對廖先生說：『仲愷。這幾年，你們在國內做官，一定很舒服了吧。』廖先生便勃然變色說：『精衛，這是你應該說的話嗎？我們自二次革命失敗以來，被老袁所逼，天天過着亡命的生活，到今日還是四面敵人，艱難應付？你六年以來，既不加入中華革命黨，又不負荷實際的工作，優游海外，反說我們是舒服嗎？』誠於中者形於外，從上述吳廖兩先生的話看來，對於汪精衛真可謂『如見其肺肝然』了。

我們要知道，共產黨來中國，其利用國民黨消滅國民黨，都是有嚴整的計劃的，計劃的第一步，無疑地要找到一個在國民黨有相當資望，而又『夙無主張』，『夸夫死權』的人，做他們唯一的工具。民國十二三年時，鮑羅廷和加拉罕等輩，便已開始物色了。當時鮑加兩人所擬議的共有三人，第一個是兄弟，第二個是汪精衛，第三個是戴季陶先生。他

們對於兄弟等三人詳加考慮之後，便各下一個承諾，以定去取，對於兄弟的考語是「難相與」，對於戴季陶先生考語是「拿不定」，對於汪精衛的考語是「有野心可利用」。這樣，汪精衛便中選了。這些事實，當時在廣東的老同志，都是十二分明瞭，可憐汪精衛却執迷不悟，以為共產黨可以幫他做國民黨的領袖，他心目中所謂唯一的大官，又何樂而不為呢。所以對華僑同志，便可說：「你們國民黨員自己不爭氣，我正要把國民黨送給共產黨了。」對本黨同志，便可以說：「反共產就是反革命。」「凡革命的向左轉，不向左的滾出去。」潛伏着自私自利的野心，到了相當的程度，便可以逐漸發展，汪精衛既已離開了革命的立場，便因腐生惡！由發展領袖變到做共產黨的走狗，一如腐了的豆醬，生出種種害人的微生物來，正不是一件怪事啊！

上星期六，南京各界在第一公園舉行討共宣傳大會，其中有決議兩點，很值得大家注意：第一呈請國府請各國政府，勿以中國共產黨作政治犯看待。第二，電告全國輿論界，主持正義，促成統一，兄弟以為這兩點，都是目前重要的事情。就第一點說，各國政府對待政治犯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政治犯在政治上本有相當的見解，不過他的政見，不幸與政

府不同，才被驅逐或通緝罷了，政治的政策，本難確定所謂絕對的是非，則各國政府優待政治犯，不用說是一種正當的處置。可是中國共產黨，除殺人放火以外，究竟有什麼政見呢？我們知道德國法國英國的共產黨，不過講些主義，並在選舉時到國會中爭若干席數而已，便是蘇俄的共產黨，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後，也沒有如所謂中國共產黨逢人便殺，逢屋便燒的行爲，至今莫斯科各處，還藉着俄皇時代的建築，來撐持他都市的門面，歐戰以前，無政府主義中之恐怖黨，專以暗殺爲事，各國政府且不認之爲政治犯，中國共產黨，其殘暴酷虐，過於恐怖黨萬倍，乃是一種變相的黃巢亂，恐怖黨不過仇視政府，牠們竟是仇視生靈。試問各國倒反能以其爲政治犯，而予以容認嗎？所以各國政府不能以政治犯看待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十二分合理的要求。

其次，關於督促輿論界注意主持正義，促成統一的事。兄弟在前次紀念週中，都約略提過，兄弟以爲目前中國的所謂輿論實在太無聊，太銷沉了！假如這種情形，可以說是主持輿論，！從事報業，那末，找幾條新聞編若干電報的人未嘗不可說是社會的指導者，辦報的人說：我們沒有言論的自由，但是我們除禁止反對三民主義，和反對政府以外，更禁

止什麼呢？過去若干報紙，對於政府機關的辦事，著論抨擊，我們都可以容忍和採納，試問在所謂擴大會議統治之下的北平天津，有這樣的寬大嗎？假如我們再予以所謂言論自由，那非准登載共產黨的宣言，便無以表示了。目前的所謂輿論，無順逆，無是非，在他們的所謂新聞紙上，不但地方可與中央對待，甚至共產黨與土匪，也可與中央對待，這種在叛逆與非叛逆之間，共匪與非共匪之間的報章，正不知其代表何國人民，主持何種輿論！這種情形，就使移到素重自由的英國美國，也必不為國民所容許，如果放在以黨專政的土耳其，意大利，和蘇俄，更不知將得何種處分了。這些地方我們中國的輿論界，實應該有深刻的覺悟！

我們確信一切反動軍閥的消滅，在最短期間內一定可告一段落，同時，并深信由於軍閥們覆滅的結果，一定可使一切軍人，得到一個嚴重的警戒，實現總理『覆滅曹吳之後，不使有與曹吳同樣繼起之人』的遺教，今後我們重大的工作，在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肅清共產黨，因為非如此便不足以保障民族的生存。同時，我們同志同胞，也應該認清我們今後祇有這兩種敵人而努力協助政府去撲滅。關於掃除共產黨一層，兄弟以為惟有適

用剿匪的辦法，有人說，江西的共產黨，力量很大，其實三年以來，既不會有過軍隊去剿，如何便知道共產黨的力量是很大呢？江西人民，大半務農爲業，共產黨一到，便不免相驚伯有，增長共產黨的聲勢，滅絕了人民自衛的力量，我們希望湘鄂贛三省人民，在今日中央贊成何敬之同志剿滅共匪的時期，更能自組團練，補中央兵力之不足，則所謂共產黨的肅清，一定可在最短期內完全實現了。（完）

汪精衛赴平之內幕及其將來之失敗 劉蘆隱

——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央第二會議廳招待新聞記者講演——

汪精衛此次因爲張發奎這一份股本虧耗盡了，窮極無聊，仍想打買空賣空的算盤，趕到北平向閻逆所發起的寧安公司請求合股，希圖買弄他過去幾年向共產黨所學習來那種狐狸精媚人的騙術，在閻馮間來攪取多少餘錢，這已是一個很顯明的事實了，可是閻錫山已經曉得汪精衛自己是沒有本錢而且來北平就是要打他的算盤的，所以精衛到天津的那一天，閻錫山明明在天津，竟託故要到前方，不肯與汪會面，據說汪精衛下馬就受閻這種冷落

汪精衛赴平之內幕及其將來之失敗

，心裏已有八分着惱，到了北平，所見的人物，又是寥落得可憐，而且重要人物，更見不到一個，於是他覺得他此來風頭不妙，疑心顛倒鈞的住宅不吉利。而他的夫人陳璧君便急忙要替他遷居，這一個所謂左派革命領袖，其行動之如何鄙俗可笑，生活之如何充滿封建思想，也已可見一斑，本來汪精衛是一個鄉愚，一個偽君子，不過從前總理喬陶提挈之下，他的長處，得總理崇高偉大的人格之保育而益彰，而其短處，亦為總理崇高偉大的人格所掩而不露，所以汪之過去，倒得了不少人們的稱譽，但是現在呢，他的真面目一天暴露一天了，而尤以這回北面向馮軍閥賣身投靠為最可鄙，從前許多人不知汪之為人，還處處迷信他，原諒他，甚至為他掩飾，替他辯護，現在大家看到他愈弄愈糟的言論行動，就是最愛惜他的人，也為之冷齒，這幾個月裏面，汪精衛北上的消息，時時都成了社會的傳聞，於是老早就有四種人對他發生兩種希望：其一，對他猶有愛惜之心的人和與他毫無恩怨的人，都希望他到北平，其二，律他最力的人和恨他最深的人，都希望他到北平來，愛惜他的人，怕他一去北平，即從此身敗名裂，恨他的人，正要他一去就從此身敗名裂，所以汪精衛此次北去，真是「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而捧他最力的人

，不過把他捧上了一條死路，其餘與他無恩怨的人，也只好袖手旁觀，任厄運去擺布他了。

我們倒是愛惜汪精衛的，始終希望他不要走到與殘餘軍閥勾結爲惡的路上去。但是事實上他自己終於不可救藥，他所以弄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是由於他始終是一個無定見無氣骨的投機主義者。他在武漢政府以後，和廣州共禍以前，忽而今天一個主張，忽而明天一個主張，言行的矛盾，已是前幾年一般國民所知道的。當時共產黨禍湘禍粵的罪惡，大半都是汪精衛一手所造成的。當時他由莫斯科回到武漢，未久即累得唐生智下台，因而也就累得武漢政府垮台，後來他一面唆使張發奎帶了共產黨到廣州去演殺人放火的慘劇，他自己一面跑到廣州去，而張發奎又垮台，他無論到什麼地方，受他迷惑的人，都要垮台的，這幾乎是前幾年中國政治上一個歷試不爽的現象。現在看起來，汪精衛還是前幾年的汪精衛，而受他麻醉的人，也一定是要一個一個倒坍下來的。前幾個月汪氏由港飛九龍之間，用盡心思去電發張發奎，李宗仁，白崇禧的，而張已失敗下野，李白亦命在垂危。此次汪忽北上，令張李白而就閑偶，閒嗎多少受了他一點狐媚，不久也一定要倒坍下來，這

是無可疑的。且看他到北平不過一星期，而他的言行已是千變萬化，他到北平之初，對參與偽擴大的蝦兵蟹將說，「我們是要以黨治國的，」而且說明「以黨治國的，是以黨義治國」，但是最近幾天，他又說要取消以黨治國的原則了。這大概是因為汪精衛到北平去投閻馮之門，事實上已自暴露其崇尚軍閥背棄黨國的真面目，而凡在北平相與仰軍閥鼻息的人彼此應都知道他們都是只知有軍閥，而不知有黨的朋友，再也不必假冒「以黨治國」的招牌來矚自己，所以汪亦欣然把以黨治國的假話取消罷。他未到北平以前，把「民主」「民主」這名詞喊得震天響，而北平改組派的標語、也說是他們這回要歡迎這一位「民主勢力的領袖」。但是最近他自己就連日開秘密會主張要嚴厲制止改組派黨徒活動，禁止民衆運動，監督輿論，而且對於國民會議，也要設法排除廣大的民衆參加，務使將來的國民會議，成爲汪閻馮幾個巨頭會議。甚至謂如時機不利，即以擴大會議決定憲法，俟將來國民會議召集得成功。再來追認，這可見汪精衛的民主氣味，事實上已微細到連民衆運動國民會議都放到渺茫之間了。我們根據事實，知道汪精衛此次北上，是帶了兩套法術去的；第一，對一般人民，從左邊衣袋裏取出「怎樣扶持民主勢力」一套法術來；第二，對於閻馮

各派的軍閥官僚，便趕快丟開「民主」那套法術，接着從右邊袋裏拿出「禁止改組派活動」「嚴防共產黨階級鬥爭」的法術來。這兩套法術舞來弄去，汪精衛自然要迷惑多少人。但同時我們就敢斷定他亦要賣却多少人，而最後被他賣却的人都垮了台，連這套迷人的，也一定不會靈起來。

汪精衛的最近政治活動，可以說是無主張，不過他拾了人家的牙慧，竊取了總理一點遺教，一般人也居然把他的話視為政治主張，已屬可笑。他們所謂政治主張，已有人逐條指斥過，我們可以不必再談。不過他近來所謂政治主張，却有幾個特點值得注意。其一，他照投合胡適之一類的人的思想，所以主張不要調政時期，而要製定約法或與約法相等的空文。其二，他又極力想投閻馮之所好，所以主張撤回一部分的兵力名為拱衛北平，實則想以兵力威脅東北當局。其三，他曉得北平軍閥是不喜共產黨的，所以他主張嚴防階級鬥爭。但是我們深知他是素來沒有真確不可移易的主見的，所以他這些主張，過了幾天又是會生變化的。譬如他對閻馮雖然說要嚴防共產黨，但是他却秘密電令南方的共匪首領，要他們照原定計劃進行殺人放火的勾當，所以現在的長沙，又遭一次焚殺的洗劫，本月二

十九日中央軍已將長沙克復了，而其匪焚燒劫殺，據說有三十個鐘頭之久。然而以此就可證明汪精衛完全猶是以其匪爲靈魂，而他却對人說嚴防共產黨，他幾乎把全國人都視爲與閻馮一樣愚蠢，可以受他欺騙，豈不更可笑嗎？總而言之，他的所謂政治主張的特點，根本上把國民看作可以任意欺騙的笨伯，於是東拾人一點牙慧西拾人一點牙慧，見了某種人受那一個腔調，便張開嘴巴唱那一種歪腔給他們聽，他却以爲到處可得人同情，殊不知真實的政治的主張，是要根本上以國家社會永久的利害爲前提，而不是以投合某種人一時的好惡爲前提，更不是今天見了甲，就投合甲的好惡，明天見了乙，就換了腔調去投合乙的好惡，汪精衛的領袖慾雖大，可是以他那樣素來看不見民族社會真實利害的頭腦，而專恃他那種投機取巧的法術，是無往而不害人害己的。記得總理從前批評過梁啟超說：「他這個人頗有小聰明，也很容易聽話，但是要用他，只有把他時時刻刻伴隨在身邊，若一旦放他出去，那就不是你的同志了」汪精衛就實在是總理所描寫的一個梁啟超第二，所以總理逝世以後的汪精衛，便一天糟一天，一直到了今日的這種模樣。總理也是知道汪精衛是最清楚的，所以當總理彌留之際，汪精衛去請求總理給他個人一種遺言，總理

說「要我病好，就有話講，若病不好，就沒有話說了。我若死了，你們的危險是很大的，軍閥官僚可以利誘你們，威脅你們，侮弄你們，而你們是不見得能够不上圈套的。」今日的汪精衛，正是合了 總理的遺言給共產黨軍閥政客利誘威迫，弄成一個同流合污的政治，總理都早已把他看透了，我們又何必多說話呢？

汪精衛之過去與現在 曾養甫

——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建委會紀念週講演——

上週由香港到北平與各種反動派流離一氣之汪精衛先生，自詡爲 總理最忠實之信徒，此人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確曾有相當之貢獻，在 總理指導之下，確曾努力黨務工作。但自 總理見背，汪先生政治之主張，思想之變化，竟至捉摸不定，前後矛盾，嘗憶民國十三年在廣州開會，反對西山會議派，力主開除鄧魯謝持覃振等黨籍，並竭力主張聯俄容共及擁護農工之三大政策，且能以蘇俄爲榜樣，學之惟恐不肖。雖經忠實同志之苦口善導，而汪先生掉頭不顧，願與共產黨共其生死。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奠定長江，以武漢爲

汪精衛之過去與現在

共黨所盤踞，乃決定都南京，實行清黨，而其時之汪先生，不來南京而往武漢，以貫徹其親英之主張，吾人當時雖反對其政策之錯誤，然對於其個人之人格，魄力之偉大，不顧一切利害而勇往直前之概，則非常佩服，因在政治上本無絕對之是非，汪先生之政策，雖非今日之中國社會所能許其推行，然其堅決主張，一貫到底，或亦自有其見地，乃自汪先生前往武漢，而湘鄂贛三省之人民，莫不焦頭爛額，不知死所。其殘忍慘酷之印象，至今猶能清楚記憶，時隔三年，而創痕尚未恢復，可謂盡受汪先生所賜，其時中央清黨既告成功，汪先生亦知三大政策之不可行，乃於七月間，開始在武漢清黨，調賀龍葉挺之共產軍於江西，而令鮑羅廷繞道回國，本黨同志，以為汪先生確知已往之錯誤，迷途知返，定能痛改前非。寧漢合作之際，汪先生曾發起特別委員會，與親自開除黨籍之西山派合作，以未得首領地位又復去而之他，高呼反對。既使賀葉反叛於江西，又使張黃燒殺于廣州，於是恍然知汪先生之為人，陰詐險狠，反覆無常，凡所主張，無非欺騙民衆，供其一己之犧牲，無所謂主義，無所謂政策，而汪先生之人格，至此亦掃地無餘。

四中全會開成，舉國喁喁望治。汪先生知國內無立足之地，宣言出國讀書，增進學問

，吾人又深望其從此改過，將來再爲黨國效力。不知自汪先生去國，兩年以來，野心不死，不擇手段，勾結共黨，爲繼續不斷違反中央之運動。以致政局阢隤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土匪共黨，遍地蜂起，均莫非汪先生之賜，計汪先生前後勾結張發奎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以至腐化官僚投機份子，不斷搗亂。最近且有所謂擴大會議。其政策之不斷變化，即社會之不斷擾亂，而三年來之民窮財盡，反叛迭起，均莫非汪先生覺悟之成績。以上爲汪先生對於黨國過去之罪惡。今再以其發表之幾點意見，加以分析，又可知汪先生人格之破產。

第一，爲籌備國民會議，以各職業團體爲構成份子，以爲召集國民會議爲總理之遺志，而提出職業團體亦易博得社會之同情。然吾人一究總理北上時之現狀，及其宣言之主旨，則知當日之國民會議，乃謀達到和平統一之一種手段，其時國民政府不能在最短期間以兵力統一中國，而國民之表同情於國民黨者，實占多數，費力少而成功大，且總理所著之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及一切黨綱政綱，均可在國民會議通過，而增加人民之信仰。此乃當時總理主開國民會議之真意。今則中央已具討平叛逆統一中國之力能，而國民黨

所定之政綱政策，全國皆認為國是。三民主義，深入人心，總理所指示之目的已達，自無急切開國民會議之必要。且召集國民會議，尤有事實上之困難，當此各種反動份子尚未完全消滅之秋，各種民衆組織尚未健全，設使反動派一旦側身會議，如何能使其不執出三民主義之範圍。職業團體之代表，農工兩界，共產黨尚有潛勢力存在，倘有違反三民主義之決議，試問將何以善其後。故今日之國民會議，在法律之立場，在總理之遺志，在社會之實況，均不能即日召集。

第二，為照建國大綱製定一種根本法，確定政府機關之組織，及人民公私權利之保障。此又似是而非之論。總理在建國大綱宣言中，已明白言之，人民未經訓政，不能施行憲法，因人民渾渾噩噩，對於破壞憲法者不知反對，對於擁護憲法者不知扶助，所謂憲法，徒成白紙上之黑字而已。故制定憲法，須在實施訓政以後，其時人民已能行使四權，權衡利害，辨別是非，有守法之習慣，具護法之能力，然後憲法之效用，方能顯著。今汪精衛先生受胡適之等荒謬言論之暗示，而有即日制定憲法之謬妄主張，實與總理之主張相背馳。世界各國之根本法律，原分整個公布與逐步公布兩種，今中央政府根據之建國大綱

與所頒布之各種重要法律，豈非與憲法有同等之效力，又何嘗無法。且汪先生言將由擴大會議制或公布，則以十數人之思想，可以制成本法，多見其不自量矣。

第三，汪先生謂民衆運動按照建國大綱，由地方自治做起，嚴防共產黨激起階級鬥爭之端。不知本黨一向主張扶助民衆，惟有汪先生一人力主聯俄容共，採納共產黨之階級鬥爭，自汪先生離開本黨，對於民衆之七項運動，久已由中央規定，次第實行，力改汪先生從前之主張。今汪先生不知改悔，尙提及此事，亦適足見其自慚而已。汪先生主張第四項各級黨部對政府立於指導監督地位，不直接干涉政治云云，不知往日各級黨部之干涉政治，乃汪先生黨權高於一切之主張所促成，今則黨政之權限，早已分別清楚，黨部與政府之關係，亦經中央明白規定，各級黨部忠實同志，亦已努力奉行，亦無須汪先生作此主張以自炫其聰。至不以黨部代表民意機關，乃屬當然之事，凡屬同志，皆體了然，何用汪先生之特別提出。至以黨義治國，與中央地方均權，總理遺教中，均已明白訂定，中央亦經努力施行，更無俟汪先生之多言矣。總之先生之七項主張，或者違背遺教，不切事實，或爲汪先生錯誤主張之結果，已經中央方爲糾正，汪先生不知懺悔，反大言不慚，責他人糾正

之不力，不知其法毒已深，斷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剷除，且汪先生日夕謀叛中央，亦不容中央專心致志糾正其錯誤，汪先生自欺欺人之伎倆，亦可廢然自返矣。

汪先生大言不慚，常自翊獨得總理之真傳，自以爲總理臨終，曾以主持全黨之責任付之於己。然吾人今日一考總理數十年之奮鬥，惟一之信條爲救國救民，絕無一毫私意於其間，此事非特總理之信徒知之，凡崇拜總理者皆知之，即反動派如胡適之等，亦不能飾詞否認，今汪氏自以爲得總理真傳，試問其所作所爲，可稱爲國爲民者何在，何一非自私自利？其前後政策之變化。何一非站在個人之立場？以惟知滿足其領袖慾而不擇手段，不顧人民痛苦之人，尙可謂總理之繼承人乎？此其一。總理之三民主義，在今日之中國，爲惟一適合之救國主義。不許有其他主義存在，今汪先生應許其他政黨產生，則總理之三民主義，其腦中早已無有，尙得冒稱總理信徒乎？此其二。總理主張新政實施，始可制定憲法，今汪先生主張即行制定法律，且召集國民會議？倘然國民會議決議無須國民黨，請問汪先生將何以善其後？此其三。

前已言之，汪先生主意在滿其私慾，如能如願以償，則雖離開國民黨，離開總理主

競，亦所不恤。不知無黨即無主義，無主義即無總理，吾不知忝顏自稱總理惟一繼承人之汪精衛先生，將何以自圓其說也。故汪先生今日之行動，欺人而已，毀黨而已，尙何言哉！

汪先生之背叛本黨，既如是其顯著，吾知稍有政治常識者，決不爲其似是而非之言論所欺，惟有與汪先生臭味相投，不顧國家民族利益者，乃相聚而爲一邱之貉而已。雖然，吾人亦殊佩服汪先生不顧一切之勇氣，以私慾不能遏抑之故，往日之反復無常，尙不肯離開黨部者，今且跳出本黨範圍，而與反動派爲伍，試觀報紙所載，北平舊日之官僚多往歡迎，而汪先生怡然受之；可見其急於一過主席之癮，是誠本黨之罪人，總理之叛徒，害黨害國害人民之罪魁矣。吾人初得汪先生北上消息，以爲萬不至如此墮落，今竟跳入火坑，不可救藥，此在本黨爲非常傷心之事，吾人對之，不禁有無限之惋惜耳。

汪精衛之罪惡

楊熙績

汪兆銘終始參差若黃翻覆，今已成爲毀黨煽賊亂黨禍民之兇逆矣！曩在廣州時，汪逆竊黨國之大柄，甘以中國國民黨受第三國際之操縱，中華民國爲蘇俄之附庸，幸賴本黨忠

實黨員努力奮鬥，芟夷共逆，與蘇俄斷絕國交，而百戰艱難，且得完成統一。汪逆不知愧悔，力贖前愆，乃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之。三載以來，日甚一日。本黨效法總理寬大爲懷，不忍深誅，再三曲宥，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僅以書面警告，本年始予開除黨籍，近汪逆於北平所謂擴大會議，僞爲領袖，肆行其顛覆黨國之逆謀，凡一切云爲，無不背叛總理，業經海內外同志一致聲討，本已不必贅述，惟汪之罪大惡極，不得不痛斥之！

以黨治國，總理之遺教也。蓋中國國民黨者革命黨也，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者也。非若歐美之政黨運用代議政治也；亦非若布爾薩維克法西斯蒂反民主主義也，爲主義而革命，爲革命之建設，其必有六年之訓政者，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使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實行革命之主義也。至憲法頒布之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謂建國之大功告成，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民大會爲最高權力機關，其代表之產生，即出於最低級之縣治。汪逆日以民治號於衆，試問爲民所治，孰有如此之盡美盡善者。今汪逆關於以黨治國與夫訓政時期，竟欲悍然取銷之，是汪逆背叛總理大逆無道，罪在不赦，彼謂召集國民會議，由此會議製定保障人權的法律，（即

憲法」大抵以爲國民會議總理之遺囑也，不知總理北上之際，本黨方局促於嶺表一隅，因時制宜，以此爲和平統一計耳，然第以之解決時局，未嘗謂裂定憲法也。現在本黨會已統一矣，不過閻馮諸逆正在破壞中，惟乘勝長驅，擒渠掃穴，直指顧問事，自當依據革命方略，勵行訓政，必至全國有過半數之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始得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本黨同志，服從總理，致力國民革命，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造最大多數人之最大幸福，保障人民的法律，立法院必能於他日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議訂憲法草案，此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二十二條有明白之規定，在此六年之內，只有遵照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進行訓政之工作，今苟欲召集國民會議，則國民未受四權使用之訓練，烏能行使中央統治權？吾人固不忍權薄國民，然而總理以創造民國之人，負建設民國之責，吾人奉先知先覺之成法，以覺夫不知不覺者，實本黨今日唯一之天職，況閻馮諸逆，據地稱兵，而豫陝甘，而晉冀察綏，七省人民，皆伏處於閻馮諸逆暴力迫脅之下，有何真正民意，敢於表見？倘以閻馮諸逆亦中華民國之國民，以全民言之不應除外；則又有我總理糾正天賦人權之說，主張革命民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有云：「

國民黨之民權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惟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然則閻馮諸逆爲軍閥也，帝國主義者之工具也，且已明明破壞民國也，此輩可爲中華民國之國民，而與於國民會議，是謂清餘孽未經宣誓歸順我國者，亦將認爲中華民國國民耶？

汪逆又言：本黨之政綱政策須提出國民會議決，成爲國民之政綱政策。夫本黨之政綱政策，以三民主義爲基礎，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領導人民爲革命之建設也。總理謂三民主義，只有實行，不容討論，汪逆乃欲以本黨主義付諸國民討論，已懷疑本黨主義，未必爲國民所信任，亦即根本上不信仰總理矣。汪逆追隨總理二十年，何自惑人，一至於此！獨是汪逆非不知以黨治國者，以黨義治國，非以黨員治國也。而必爲此說者，迎合安福系研究政學系及一切非黨員而向存反革命者之心理也？不然，何以解於土耳其國民黨乎？其取消訓政時期者，亦恐閻馮不耐黨權高於一切之束縛也。汪逆因個人權位之

私，至於毀棄二十年父事師事之總理，以獻媚閹禍諸逆，真與劇秦美新之楊雄，諂事張昌宗之宋之問等耳。昔同志有謂汪兆銘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唐詎知脂韋成性，慣以妾婦之道，狐媚事人耶？雖然，以上所述，吾人猶以黨員責汪逆也，不知汪逆早已喪失黨員資格矣。請試言之：

汪逆在同盟會時，亦民報編輯之一，鼓吹革命，功不可沒。其論革命之道德，以釜薪爲喻，人爲釜而已爲薪，大義凜然，莫不想望其豐采；同志中多有主暗殺者，而總理革命不取暗殺，同志中必欲暗殺亦激於忠義，見仁見智之類也。汪逆親炸戴潭，排衆義以冒萬險，此實革命同志中不可多得者。廢廷廢革命黨之聲威，不敢戕賊，王莽不死於誣恭下士之日，王莽之不幸也。

民國成立，汪逆力主袁世凱在北平就臨時大總統職，說者謂汪逆受袁世凱之賂若干，事雖不可知，然其與反革命妥協，遺禍至今，愛汪逆者不能爲之諱；此後清流自命，鳴其高潔，一時有汪逆人之稱，同志有作辯姦論者，輒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言誠足誅其心，良以天下之真小人不足畏，惟斯世盜名之僞君子可畏。汪逆者僞君子也，

其不作議員固已，而不作官者，不作小官也。然汪逆有廣東省政府及省議會之厚誼，以收實利，而其宗族親戚棧津要，雖龍濟光禍粵而晏然如故。癸丑失敗，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汪逆不肯加入，走歐洲以避之，若將挽焉，人有勸之者，則曰：「我不上梁山泊」。總理護法，世所共仰，汪兆銘乃紀程璧光總長之像曰：「六年作亂，奉黎大總統命南下，與今總裁孫公定大計，倡護法，率艦隊至廣州，國命賴以弗墜」，一味其文義，豈非程璧光總長奉黎元洪命以護法耶？變亂事實，舍總理而媚黎元洪，此碑尙在海珠公園，可覆按也。

陳逆炯明謀叛，汪逆以調和自任。六月十五日，葉逆舉在白雲山開會，汪逆向往來於其間。民國十三年，汪逆不贊成總理容納共產份子加入本黨，乃總理逝世，加拉罕炮羅廷等欲亡吾黨，而以汪逆爲石敬瑭李完用，故散之以首領慾，汪逆果爲所動，遂爲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宣戰之梁啓超。自是以來，日奔走鮑羅廷之門，事鮑羅廷不啻太上皇，鮑之邸中直一命令之府，汪逆但奉令承教唯謹爾！共產黨製造左右派之謬說，欲離間吾黨，分裂其勢力耳；又曲解三民主義而以偽亂真，然其言出諸鮑羅廷之口，人未必信；若

自汪逆之口出，效有若干倍於鮑羅廷者。汪逆之言曰：「除左派爲真革命外，其餘皆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也。對反革命者寬大，便是對革命者殘酷」。

嗚呼中國國民黨者革命黨也，凡中國國民黨員皆革命者，即不得爲中國國民黨員爲有左右派之分，又焉得容此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爲右派於黨內？此理不可通，而汪逆津津焉樂爲應聲蟲者，承鮑羅廷之意旨，爲誅鋤異己之藉口已也。總理容納共產分子，加入本黨，蓋從思想上糾正之，預防階級鬥爭之慘劇也；其獲鄧澤如同志書曰：「陳獨秀若不服從本黨，我必去之」。汪逆乃使本黨幾亡於共產黨，真總理之罪人矣！

亡人國者必先亡其國之歷史，共產黨欲亡吾黨，必先亡吾黨之歷史，故曰：十三年以前所流之血皆爲獸血，其侮辱吾黨爲何如？汪逆從而和之：謂十三年以前之黨人皆非革命黨，汪逆非十三年以前之黨人乎。誣蔑總理極矣，是喪心病狂語也。汪逆欲爲黨皇帝，不得不思所以傾陷在黨中有深長歷史之師友，以爲所欲爲，所以八月二十日之後，因軍滿廣州市，汪逆幾欲藉以逞其一網打盡之計，總理信徒於此欲留粵乎。則日思殺賊，手無斧柯：欲去粵乎？則不忍輕棄革命策源地也。惟有含忠履潔，爲吾黨爭人格而已。

，所抱者孤忠，所持者正義，汪逆將如之何？設不幸而見殺，則死亡七十二烈士求仁而得仁矣？果也，三月二十日之變，而汪逆遁逃，惜乎博寬大之美名，貽除惡不早之憾。

追蔣主席督師北伐，共產黨不欲我成國民革命之功，百計阻撓，而蔣主席不顧也。大軍出發未踰時，而底定鄂湘，共產黨徒盤據武漢，致政府北遷之際，踴躍於南昌；汪兆銘海外歸來，吾人以爲或有悔禍之萌，乃與陳逆獨秀發爲國共兩黨之宣言，到漢時在中央日報大書特書曰：「革命的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于是湘鄂贛演成赤色恐怖，所謂三大政策成爲聖經，人民皆羅閻獸之禍，汪逆之肉，其足食乎？身陷賊巢之同志，咸謂中華民族能立五千年之久，國民必有其特性，假令有一鮑羅廷得玩弄人人如汪逆，此實亡國滅種之民族，必知其不然也。四月十二日即有清黨運動，十八日定都於南京，黨國不亡，賴有此耳；彼汪逆者尙奉第三國際之命令，反共倒蔣，既欲倒蔣，何必分共？既已分共，則蔣主席等爲救黨之工人，又何可倒？此種矛盾理論，第三國際之絕技，汪逆特奉行命令之人也。未幾，孫傳芳渡江，首都幾危，追悼龍潭陣亡將士時，恨未斫汪逆及李白諸逆之頭以祭先烈；嗣後利用唐逆生智之抗命，嗾使張逆發奎之禍粵，彰彰在人耳目，汪逆

實爲禍首罪魁。由此言之，汪逆其爲本黨黨員否耶？或曰：汪兆銘何以不見擯於總理也。曰：總理與人爲善，不念人之惡者也。總理在時，汪逆有所忌憚，不敢勇於爲惡；縱有過失，總理能化其梟獍之性，人亦未及覺察；總理而逝，汪逆之獸性乃完全發揮，獨是其逆可殺，然可曰猶有所謂主義也。汪逆以中國國民黨黨員作共產黨之虎狼，萬死不足以蔽其罪；昔孔子殺少正卯，以其言僞而辯行僻而堅也，汪逆非所謂聞人乎，罪有過於少正卯，吾民有判斷是非之能力，當爲國人所共棄也。日昨報載汪逆以湘鄂共匪猖獗，挺電張桂軍進兵，大言不慚，抑何可笑，徵獨張桂諸逆勢力早已消滅，即以湘鄂贛共匪猖獗論，皆汪逆於十六年所種之禍，致今日在長沙爲劇烈之爆發，現又毀黨亂國，使政府專注力於討賊，未遑西顧是又湘人蒙此慘禍！在在皆汪逆之罪也。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

V4